

老師・長官・同學

徐詠平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人人文庫

特六六

11
042
34

徐詠平 著

『老師・長官・同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計920.5
4 2 7 7



老師・長官・同學

著者 徐詠平

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發行人 朱 建 民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基本定價 壹元整

校對人：王秀雲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及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Wang

徐詠平

浙江蘭谿人，民國元年生。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畢業。曾任漢口正報主筆，教育部編輯，重慶益世報編輯，廣西中央日報社長，桂林論壇報發行人，南寧晚報董事，重慶中央日報社長，中華日報南部版主筆，成功晚報社長，中華日報總社副社長，高雄中國晚報社長。現任政治作戰學校新聞學系教授，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教授，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原報業行政科主任，「小世界」週刊發行人。著作有「報業管理」、「報業經營概論」、「革命報人列記」、「陳布雷傳」、「新聞學概論」、「彩色平版印報之研究」、「陳果夫傳」等十四種。其中「陳果夫傳」曾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傳記文學獎及行政院新聞局優良圖書金鼎獎。

本書是另一種寫法的回憶錄，敘述作者求學與服務的經過。描寫九位與他有密切關係的老師，長官與同學。作者大學畢業後，憑自己的工作成績受人賞識，擔任新聞、文教與宣傳工作。讀了這本書的青年，能從中得到一種啓示：但問耕耘，必有收穫。

本書內容的時代背景從北伐、抗戰到戡亂。作者在這大時代中，為了理想與志趣，怎樣刻苦奮鬥，有不少生動的故事。文筆平實、流利、清淡，有另一種風格。

老師・長官・同學 目次

老師・長官・同學	一
(一) 抗戰起後・參加筆陣	一
(二) 初次入川・編書編輯	一五
(三) 在教育部・徵介教師	三一
(四) 自渝抵桂・前線做報	四九
(五) 京桂往返・合庫成立	六八
(六) 再度入川・最後撤退	八六
(七) 革命工作・從頭做起	一〇七
(八) 臺南八年・合作愉快	一二七
(九) 臺東劍公・忘年之交	一四七
(十) 求學苦讀・往事如昨	一六四
竹與戰時生活	一八六
三遷記	一九〇

老師・長官・同學

這篇文章，非個人回憶錄。我沒有什麼值得寫的回憶。只敘述這幾位老師、長官和同學，在工作中如何關懷我，獎掖我的故事，也是我求學與服務的經過。

(一)抗戰起後・參加筆陣

民國二十四年夏，我畢業於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系，奉派回到我的故鄉——蘭谿實驗縣實習。同期畢業、同時派去的有二十餘人。我開始為社會服務。接受了四年公費的革命教育，決心以五倍的時間，十倍的努力，報答黨國。

在蘭谿實驗縣政府只實習了一個月，因附近由前期同學任縣長的兩個縣政府亟需人手，於是提前分發，前往任職。原來的實習期間預定三個月。第二年又調到另一個縣。那種工作，總覺不合個性。雖然待遇很好，生活安定，官場習氣不如以後的惡劣，但對我來說，實無好感。二十六年一月，毅然辭職，隻身抵南京，另謀發展。可是操畢業生工作大權的總務主任吳抱峯先生說我擅自離職，硬不給再派工作。數月後，跑到鎮江，得同學劉覺民之助，在江蘇財政廳做了一名編

御外相當於科員的服務員。三個月後，又隨一位新發表到安徽省當縣長的前期同學盧克裕去當科長。皖北地瘠民貧，風氣閉塞，殊不習慣。

抗戰起來了。我想：我該參加抗戰工作，不能再做這種乏味的地方行政工作了。到了漢口，住在校友劉能超宿舍，要找我理想的抗戰工作。人海茫茫，浪蕩度日。九月，在武漢的幾位前期同學創辦一家日出四開兩張的日報「正報」。樓上是校友會通訊處，招待各地來漢口的校友。我移住通訊處。夜間爲「正報」義務寫一篇短評，供應一頓宵夜。這正是我十分合適的工作：用筆殺敵，參加抗戰。午夜到凌晨，自動幫忙校對，跑印刷廠看校樣，學到一點編校技術。自己還有點錢，但也用得差不多了；却一點也不發愁，因爲物價低廉，工作很起勁。有一家從上海遷設漢口的東亞書店登報徵稿，我譯了「毒氣與毒氣戰爭」和「日德軍事同盟之真相」兩本稿子送去後，很快的得了二百元稿費，日子過得很寫意。兩本書也出版了，銷售不少。

南京淪陷前，南京各機關西遷武漢，中樞宣布遷渝。「正報」主持人謝澄宇、王鏡清、劉能超，某日聯名宴請從南京到漢口的朋友喫飯。總編輯王漢中和義務主筆我作陪。主客是久仰其名讀過他不少著作的「食貨月刊」主編、北大名教授陶希聖先生，正中書局總編輯葉溯中先生和總經理吳大鈞先生。席間靜聽他們談國際局勢，抗戰前途，中共態度，中、蘇關係與歐洲動向。

葉溯中先生，浙江溫州人。曾任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校長，浙江省教育廳長，此時爲考試院考選委員，兼正中書局總編輯。長方臉，笑起來很美，雙眼眯起，把頭一搖。我曾在杭高前身——浙江省立高級中學唸過一年書。葉先生聽我說起，瞞了我一下。席散，他要我明天上午到漢

口後花樓萃華大樓三樓正中書局臨時辦事處去看他。我唯唯。

翌日上午，到了正中書局辦事處，看到葉溯中先生。他正和一個年輕約二十一、二歲的少女在談話。我說：「葉先生，我來了，不知道有什麼吩咐？」他先介紹我認識那位嬌小、瓜子臉少女，是他的姪女兒葉若蘭——後來是我們的好友鍾榮蒼夫人，然後取出一張五百元的支票。說要辦一家週刊和一家出版社，囑我籌備。租辦公室，裝電話，租辦公家具及購置炊事用品，辦妥後再去商量。

這真是出乎意料的奇遇。我不是他杭高校長任內的畢業生，喫飯時不諱言我是浙江省立高中二年級被勒令退學轉入寧波省立四中畢業的，因為在杭州省立高中不用功讀書，活動太多，給「民聲報」編週刊，愛逃課，喜多話。我又未把出版的小冊子送請指正，在「正報」只每日寫一篇短評。撤退到漢口的正中書局人才濟濟，怎會選用我爲他辦這件事？後來聽葉若蘭說：「我三叔一看到你就喜歡，說你能幹！」又說：「三叔看過你在上海和漢口出版的書」。出版家經常注意新書的，竟記起我在上海汗血書店出版的兩本小書：「列寧小傳」、「莫索里尼傳」和在漢口出版的書。

辭出後，租到貫忠里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一座，租了家具，裝好電話，買了用品，開了賬單，連同餘款，三天後再去正中書局看葉先生。他和我一同走到貫忠里，看後很滿意，還要我找兩個助手，說定十二月一日開始工作。於是請了兩位流亡到漢口的後期同學，參與工作，一位兼管總務。週刊——「民意週刊社」在樓下，出版社——「獨立出版社」在樓上，如期成立了。樓下有主編周伊武，三位年輕女學生，葉若蘭爲其中之一。一位青年龐君管雜務。樓上有我們三人，葉先生又帶來兩個年輕大學生，也是流亡到漢口的。不久，童蒙聖從浙江到漢口，參加獨立出版社

的編務。樓上連工友兼廚司八人，樓下五人。亭子間我們打地鋪。

這是一個奇怪的組織，誰都沒有名義。葉先生是「民意週刊」發行人和獨立出版社長，我們大家當面尊稱先生，背後叫他湖老。其實並不老，不到四十歲。待遇也特別：樓下支固定薪水，主編八十元，其餘四十元，寫稿另支稿費。樓上董蒙聖八十元，我們每人月支三十元，但規定每週編十萬字的「抗戰建國叢書」一本，支稿費每本三十元。社中指定多編一本則多三十元。樓上下打成一片，工作十分忙碌。葉先生一文不取，上下午均挾一個大皮包來看稿，隨時帶來支票，作一切費用。社中又供應食宿。

我學到寫稿與編排，校對仔細週到。週刊文必算清行數，不許轉頁，寧可刪去，有餘須補白，四面加框。校對時要注意行頂無點號，一點不成行，行多不得抽片。叢書亦然：每頁必須另面，章節必須分明，末附討論大綱。週刊要補白，常給叫去補數行，也有稿費。

週刊與叢書的銷路極好，定價均為法幣一角。週刊有三家：在漢口的稱「民意」，鼓吹民族主義；在長沙的稱「民力」，鼓吹民權主義；在重慶的稱「民心」，鼓吹民生主義；合為三民，為抗戰宣傳。獨立出版社出版「抗戰建國叢書」，有時亦印行專冊。叢書十本一輯，版口一律為三十二開。每輯封面不同。取材當時國內外報刊發表的文章，先定書名，再定章節，經討論後推由何人主編，自找資料，加以整理，取齊匯同，註明來源，有系統的編成，要有討論大綱，無不歸結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編得快，印得快，銷售亦速。青年求知慾強，時事最為關心，叢書正合需要。發售尚有盈餘，資金週轉很靈。

其時，中共已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中共在各地公開活動，左傾分子也十分活躍。新華書店在漢口開店，「新華日報」在漢口出報。意志不堅的青年易受誘騙，投奔陝北。我們在週刊上常揭穿中共的陰謀，叢書亦針對中共胡說，甚至比新華書店出版得還早。如「臺兒莊大捷」、「張鼓峯事件」、「我們的外蒙古」，……我們先出版，中共後出書。中共攻擊托派，葉先生叫我去訪問住在漢口吉慶里某號民房的陳獨秀。我不相信這說話低沉，個子瘦弱的半老頭子是中共的「開山祖」。回社後找到許多資料，編印一本「陳獨秀與所謂托派問題」。我自己也才明瞭「托派」爲何物，陳獨秀是怎樣的人。那年，中樞派大員祭黃陵，僞「陝北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脫離共黨，投奔自由，到了武漢，住在武昌曇華街。葉先生又叫我去看張國燾。面長耳大，臉色紅潤，身高肩闊的中年人，怎會落草爲寇？我真想不通。回社後編印一本「張國燾脫離共黨面面觀」，又寫了一篇「張國燾訪問記」，由「民意週刊」印送全國各報發表。我們宣傳抗戰建國，也堅決反共。葉先生是反共到底的，他說共產黨終究是禍害。兩書銷售數版。有人說閒話，說共產黨既然輸誠，怎可製造摩擦？因而共黨又叫出了一個名詞「摩擦專家」，是指反共者。我們反共如故，是反對中共的口是心非，貌忠實詐。事實證明，不是中國人的中共，只是叛國竊柄，禍國殃民的畜牲。

那時，有一個「藝文研究會」，總幹事陶希聖。下設六組，葉溯中先生任出版組長。「民意週刊」和「獨立出版社」的經費來自「藝文研究會」。因爲經營得法，自給有餘，不再領取津貼。又有一個「三一聚餐會」，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在不同的飯館聚餐，我們都參加，似乎

由藝文研究會或中央宣傳部邀請。凡是在武漢參加新聞文化工作的人，都接獲通知。「屆時前往喝酒喫飯，自由交談。黨國要員，革命先進，如葉楚傖、于右任、戴季陶、陳布雷、朱家驊、陳立夫、蕭同茲、程滄波……諸先生也時常到會。汪精衛更是能言善道，風采動人。想不到「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後來竟會做漢奸！

「三一聚餐會」無固定地點，以沔陽飯店與德華樓舉行的次數較多。酒任意喝，菜夠喫飽。前輩們親切平易，沒有架子；也沒有訓話。盡歡而散，回去各就所知，撰文宣傳。立場一致，寫法不同。中共又造謠說：「三一聚餐會」是國民黨專門研究對付共產黨的，是表示：「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一點也不錯，國家必須統一。只有「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府——國民政府；一個領袖——蔣委員長」。中共妄想分裂，我們堅決反對！中共已經宣言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服從國府領導，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怎可說這種無恥的話？

溯中先生的領導方式很特別，待遇平等，又論件計酬。沒有簽到，盛椅，樣，不開會，隨時談。週末一定請我們喫小館子，圍坐大圓桌，報告時事，中央對某事立場，說明下期週刊內容重點，叢書該編些什麼。像老師對學生，娓娓溫溫；又像家長對子弟，勸勉親切。他的工作精神，着實可佩。稿必親閱，樣必自校。我們編好的稿子，經他改動數字，加了數行，文氣就不同。有時把須改正處用紙條夾入，要我們自己刪正。是最好的國文老師！校對更仔細，我們校過後他看清樣，一下給他找出錯處。校書如掃落葉，落葉都由他肅清。他本身的職務夠忙，但每天必到社，

和我們一起工作，純盡義務。社中經費公開，盈餘甚多。有人錢不夠用，寫了便條照借，可是不扣，往往成爲「西原借款」，借而不還。節日另發零用，但無加班費，因無所謂加班。

精神愉快，生活自由，工作忙碌，興趣極濃，效率很高。最令人懷念的是不打官腔，不罵人。如有錯失，他老先生就取下眼鏡，把頭靠在支起的右手肘，默不作聲的在思考。我們知道有問題了；但是我們一點不恐懼，片刻後一說，就過去了。週刊社與出版社，能一開辦就打開銷路，不是無條件的。同事之間無隔閡，各做各的，分工而能合作，當日事當日畢。

二十七年五月間某日，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長陳禮江到獨立出刊社來看葉溯中先生，說教育部要辦一種週刊，定名「教育通訊」，但非公報性，爲向社會發行的期刊，宣導抗戰建國的戰時教育。因爲「民意週刊」辦得很出色，他來和葉先生商量，有點請教性質。他們談時，我也在聽。葉先生說：「詠平！你幫忙擬個計畫」。我答應下來，但怕做不好，約定明天交卷。那夜，我就起草「教育通訊」週刊編印計畫，未附經費概算。翌日，他們二人同看草案，認爲尙妥，只是預算數字太大，恐怕通不過。我說編預算必須加多三成，可讓會計核減，同時，預算宜寬，執行從嚴，用有節餘，人有好評。這些話是我在政校唸書時聽來的。至於編預算是在地方政府工作時學來的。不久，「教育通訊」出版了，葉先生也很高興，我偶亦投稿。

既然教育部宣導抗建教育，獨立出版社該出版抗建教育小冊子，於是這一輯「抗戰建國叢書」內容全部以此爲題，速編十冊。我分配到兩本。我連教育概論之類的書都沒有讀過，自己都未

搞通，怎能編這類書？於是數次渡江到武昌去省立圖書館借看有關教育的書籍，邊讀邊做筆記。夜間跑書店，購買刊有教育論著的期刊。忙了半個月，才編成兩冊。編書必先讀書，自己也得益。某日下午，自武昌搭輪渡回漢口，忽見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與一中年人也在渡船上。

在政校唸書時，黨國先進與學術界人士，常來校作專題演講。戴季陶先生講「日本論」，陳立夫先生講「唯生論」，羅家倫先生講「新人生觀」……後來都出書。立夫先生富有吸引力，那吳興口音的普通話非常悅耳。我當然認出他，他自然不認識我，因為從未單獨見過面。立夫先生是我們的校務委員，代理過教育長。我乃趨前問候，自報姓名與現在的工作。他見我手中持一大包資料，問我看的是什麼書。我說要編一本小冊子「抗戰建國教育概論」。他眼睛一亮，說你是學教育的嗎？我答不是的，是葉溯中先生要我編的，我有些稿費可拿。退回自己的座位後，我仍利用時間看資料。

回到獨立出版社，我對葉先生說，在輪渡上見過陳部長。他「啊」了一下。數日後，陳禮江先生又來社，很高興的說「教育通訊」外界的反應良好，稿源不愁，銷路亦佳，看情形可以自給自足。陳禮江又說，教育部將設立「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從事先編補充教材，再編新教本。除公開招考編輯外，並物色能編書的年輕、有經驗的青年參加。陳禮江去後，我問溯中先生，能不能給我介紹一試。又說，如果事成，我仍可為出版社編書，盡義務亦可。葉先生未置可否。

六月間，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成立，招考錄取的人員報到後赴渝。我那時經劉百閱先

生函介，由在中央社英文部主任編譯的同期畢業同學陪同見過蕭同茲先生，晤談之下，因中央社各地分支機構撤退的人員尙苦於無法安插，新人暫時無法可設。我也把經過報告了葉先生。他知我有意另謀發展，於是給我寫一封親筆致陳立夫部長，我帶往先看陳禮江，並以此出版的幾本書送呈。他說不必見部長了，他會轉達。

不到一週，派令送來了：「茲派徐詠平爲本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公民科編輯」，另有通知書一份，薪水月支一百十元，發給川旅費七十元，具領後自行前往重慶教育部報到。真是喜出望外！既未經考試，也未經面談，輕而易舉的得到派令。葉溯中先生與陳家有姻親關係，陳禮江一定給說好話。陳部長可能還記起在輪渡中看書的政校畢業生——我。

六月底到教育部辦好到職手續，領了七月份的薪水和旅費。獨立出版社的稿件交清。葉先生約我一人同去喫小館子，算是餞行。告訴我許多做人的道理。我有自知之明。我能喫苦，賣力，同情人；但我有缺點：任性，滿不在乎；自負，易得罪人。

七月二十一日到重慶，報到後在上清寺美專街山頂陶磁職業學校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從事另一個階段的文字工作，開始我編教科書的編輯生涯。

武漢撤退前，「民意週刊」與獨立出版社遷到重慶，在馬蹄街租了兩進兩層大樓爲社址，我常常去看那些老同事和新朋友，葉先生要我編書。其中有一本「民主政治問題在中國」，是駁斥中共及其尾巴巴叫黨召開國民大會的，因爲戰時不宜實行西方的民主體制，應予駁斥。爲寫此書，又

得一奇遇。

到重慶後，不像漢口，地廣人多，事忙任重。獨立出版社人員增多，出書更多，業務益旺。編輯委員會「五三」、「五四」大轟炸後，遷設北碚。我很少去重慶，只有通訊聯絡。「民意」、「民心」、「民力」三家週刊相繼停刊了。葉溯中先生已辭去正中書局編務，專心致意經營獨立出版社。但他還夠忙：考選委員、國民參政員、青年團秘書處長、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有時講課，一度因肺病住歌樂山醫院，一間小病房，空氣又不好，價復不賤。吉人天相，忙出來的病，癒後出院，其忙如故。

三十年，我請假一年，應聘任自昆明遷渝復刊的天津「益世報」編輯，後又兼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社主任秘書，又兼編教科書編輯委員會的附屬小單位「學生之友月刊」。因工作關係，與獨立出版社往來更多，見到葉先生時，他總說：「詠平，你很行，很行；但是要細心，要細心！」三十二年秋，我去廣西做報。抗戰勝利後到南京還見過葉溯中先生。他當選了制憲國大代表，又當選了立法委員。創辦「勝利週刊」，宣揚國策。獨立出版社已企業化，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我為股東之一。葉先生是常務董事，總經理易人。總公司設在上海，接收了敵偽產業，有門市與印刷廠。遷戰失利，獨立出版社遷臺北，在中山北路口鐵路邊有一鋪面，出售書籍與文具。我去看過，一付無精打彩的樣子，了無生氣。主管黨營文化事業的中央財務委員會曾有意要我去接辦，但看過後，知該社已是一個空架子，只有幾付紙型，一些舊書，鋪面是租的，員工三、五